

来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德兰 著

求真三部曲之二



来

德 兰 著

求真三部曲之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年轻的女主人公廖凌之于五十年代初回国，在某外语学院任教。命运使她在人生道路上和爱情生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她出于对祖国，对真理执著的爱，终于做出了抉择。这部小说描述了廖凌之以及她周围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那风起云涌的三十年中的生活和奋斗，作品前后充满了机智和幽默，同时又蕴含着探索人生道路的哲理。

求 (第二部)

qin

求真三部曲之二

德 兰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67,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5302-0111-5/I·107

定 价: 2.90 元

献 给

当代千千万万追求真理

探索人生道路的中华儿女

目 录

第一章 回 首	
——于南昌、巴黎、北平·····	1
第二章 思 索	
——于北京·····	30
第三章 砥 砺	
——于安徽、北京·····	71
第四章 奋 力	
——于广州、北京·····	125
第五章 考 核	
——于北京、长白山·····	162
第六章 续 求	
——于北京、长白山、伦敦、圣阿斯本·····	204
后 记 ·····	244

第一章 回首

赵孺山写了一篇极为简短的回忆录叙述他先后结识廖凌之、欧阳云和吴仁的来龙去脉。

一、朝霞

回顾往事，犹如看茫茫云海，乱云缤纷，一片片在天空中飞渡而过，一去不复返，唯有那最灿丽的云朵，却在观云者的脑海里长久飘浮。童年片段似朝云，霞影烂漫，因而在人们的记忆中依依留恋。

我小时候家住南昌。我是个遗腹子，母亲守寡，历尽艰辛养大我们三个孩子。我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大十多岁。

记得大约在我十岁的那年，有一天，姐姐回家带来了他们幼稚园的一个五岁的男孩子。他留个小平头，身穿对襟短袄。姐姐把他牵到大哥跟前说：“这就是廖凌之。”

这孩子一进我们家房门，既不看人，也不叫人，他的眼睛横扫墙上的画后，立即闪烁着喜悦的亮光。然后，他一幅、一幅地仔细欣赏大哥画的画，差不多每观赏一幅，便背诵一首唐诗，同时嘴里连连叫好。大人跟他说话，他根本听不见。

母亲乐呵呵地望着他说：“这不是廖继宗的儿子吗？他

爸爸小时候就是这个模样。”

姐姐对着母亲的耳朵，嘀里嘟噜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说完，她们望着我笑了起来。

从那天起，这孩子经常上我家来学国画。大哥叫他的学生“小知音”，我们全家人也跟着这样称呼他。当时他还没有桌子高，大哥便让他跪在板凳上，上身趴在桌上学画。小知音一跪就整整一上午或一下午，一直等到大哥提醒他该回家去吃饭为止。我们家的板凳都是硬邦邦的，而瘦猴似的小知音看来从不感到膝盖疼。

小知音每次来学画，我们家那间小房间便立刻热闹起来。他每画一笔，大哥都要评论一下，大部分时间都是喝采叫绝。我有时候也来画几笔凑热闹，可是，几乎每画一笔，都要挨大哥的批评，有的败笔实在不象话，他便给我的后脑勺一巴掌！

我笑了。

小知音问我：“赵叔叔打你、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总要笑？”

“我从小就习惯了，”我笑着回答。

“他为什么总要欺侮你？”

“欺侮我？不，大哥和姐姐可喜欢我呢！”

“那么，为什么要打你、骂你呢？”

“我……我也不知道。”

我的母亲正坐在一旁纳鞋底，她笑嘻嘻地插嘴说：“打是疼，骂是爱嘛！你们大了自然就会明白的。”

我从十一岁起，每天放学后在百花洲大街卖晚报。我卖报的第一天，小知音便来看热闹。开张的这天果真很“热

闹”——忽然下了一场阵雨，结果街头行人稀少，天黑了报纸也没有卖完。

姐姐打了一把伞跑来，要换我回家吃饭去，我不肯。她使劲拉我，我也不走。

姐姐气得用食指使劲敲我的脑门。“你这个木头人！你哪里是人？你是头牛啊！你饿死拉倒！小知音，不要理他！”她转身就走了。小知音转眼也看不见了。

“买晚报！……买晚报！……”我的肚子真饿！

远处来了个小孩子……果然是他！……他一手拿着一个小饭团子，板着脸对我说：“这是我做的，里面什么也没有放，吃不吃？不吃拉倒！”——那两个冷饭团子的滋味，我至今忘不了。

从此后，每逢雨夜，小知音便送来两个小饭团子，并且还帮我喊：“买晚报！”

过了不久，我记得好象是我刚进中学，有个星期天，我上小知音家办的女子学堂去找他。他有个跟他差不多大的表妹，问我找谁。这个小姑娘长得特别清秀，说话也很温柔。她一问我，不知道怎么的，我马上就感到脸上发烧，话都差一点说不出来了。我只好眼睛盯着地回答：

“我是……是来找廖凌之的。”

“呵！你要找灵子姐，她……”

“不，我是来找一个叫廖凌之的小男崽子的。”

这位小姑娘突然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我觉得自己的脸更烫了。

“灵子姐！有人找你。”

“来了！”从房间里果真蹦出来了小知音！他（她？）对

我说：“是孺山呀！你今天脸上怎么那样红啊？”

“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男崽子，还是女崽子？”

小知音也笑了：“我当然是女崽子呵。你怎么不知道？赵老师没有告诉你？赵婆婆和赵叔叔都知道呀！”

“他们一定是故意瞒我的。唉！你怎么变成女的了？”

她们两个小姑娘又发出一阵笑声，并且还交头接耳，四只眼睛盯着我。我觉得全身发烫，好象得了重感冒似的！

“我没有变成女的，”小知音说，“我本来就是女崽子嘛！”

“你怎么是个女崽子呢？真糟糕！”

“为什么是女崽子就糟糕呢？妹子！你听见没有？他说女崽子糟糕……”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是个女崽子，我就不能跟你玩了。”

“为什么我是女崽子，你就不能跟我玩？”

“人家都会笑话的。”

“可我是男崽子打扮，别的小崽子都不知道。”

“可现在我知道啦！”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为什么就不能跟我玩呢？”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男崽子怎么好意思跟女崽子玩呢？”

“你不想跟我玩就拉倒！”

“我不是故意不跟你玩。嗨！你为什么偏偏是女的呢？”

“你不跟我玩就走吧！”

我现在脸也不红、身上也不发烫了，而是脑袋昏沉沉的，似乎还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我慢慢地转过身向外走，

嘴里还念叨着：“嗨！她怎么偏偏是女的呢？”

我迈出她家大门时，听见小知音的怒声从我背后迸发出来：“你不跟我玩，以后不准再来了！我再也不上你家去了！”

我一回家立刻向我母亲核实这件事，果真如此！正因为家里知道我见到姑娘就害臊，所以一直瞒着我。怪不得小知音第一次来我们家时，母亲和姐姐也交头接耳，然后望着我笑！

说也奇怪，平时小知音向我提一连串问题，我最后总是厌烦，可是现在有好些日子没有人向我提问，我又感觉闷得慌。正巧放暑假了，我们院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子，我一向很少和他们玩，现在主动去找他们解闷，但是觉得他们只会打打闹闹，没有多大意思……

我家里大人都问：怎么好多天没有看到小知音了？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和小知音已经“决裂”。大哥看见他的高足好久不来找老师学绘画，也着急了，让我去叫小知音，我不肯去；他骂我，我也不去……

在那漫长的暑假里，我除了黄昏卖报以外，日夜埋头读墙角里的那些书，书中经常发现小知音曾提到过的某些问题的答案，我多么想告诉她呵！——小知音！你为什么偏偏是女的呢？……

有一天晚上，天老爷下了一场暑期罕见的暴雨。天气虽然凉快了，但报纸又是一时卖不出去……七点……八点……快九点了……小知音再也不送饭团子来了……

开学第一天，放学后我取了报纸来到百花洲，刚要开始卖，小知音忽然出现在我眼前，她气呼呼地将她的书包向我劈头甩来，并且还骂我：“你这个木头人！你是块又大又硬

的木头，你哪里是人，你是头牛！……”

这时有一位买报的先生帮我下了台阶。他看见小知音个子小小的，但是又打又骂我这个大个子，便大笑。他说：“这个小崽子真凶啊！”

于是，我立刻对小知音说：“你既然和小崽子完全一样，那我还是跟你玩吧！”

二、本 性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快要打到南昌时，我家逃往内地，廖家迁至赣南，而十三岁的廖凌之却奔往英国找她的亲生父母。此后，我们两人相别十余年，从未通音信。

后来我在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

解放前夕，靠工资、月薪吃饭、养家的人，每月领取成叠的百元一张的钞票，其实际价值每时每刻都在下降。因此，工资一到手便需要赶快带着这厚叠钞票直奔粮店，因为粮食随时随地又要涨价。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这段时期，在北大宿舍附近的北长街粮店门口，我看见一位年近半百，戴着近视眼镜的北大女教员，扛着一大袋面粉走出粮店大门。她的身材较瘦小，那四十五斤一袋的面粉把她压得走路都有点不稳，我连忙过去把面粉袋抢了来，甩到自己肩上：“先生！您是回北大宿舍，对吗？我帮您带回去。”

“不，我住在南长街，还有一段路呢。多谢你的好意！”

还是让我自己扛吧！”她想抢回去。

我当然没有放手，而把面粉一直送到她家。一路上我们俩聊天，谈到北大人多，我们虽然互相都曾经见过面，好象在昆明就见过，但是互不知姓名。我这才把人和面孔对上号：她就是欧阳云，生物系教授，起码在北大是有点名气的。我劝她以后不要自己去买粮食，让家里人买了扛回。我只是到了她家才明白，原来她是独身，有一个白发老太太帮她料理家务。她指着满院子晒着的用煤末做的半干半湿小方煤块说：“老大娘上年纪了，不要说扛面粉，就是蹲下做煤球也困难，她的腿不方便。我倒不怕干这些事，只是煤球得一个一个搓，太耽误时间！太耽误时间！”她皱着眉，边摇头，边叹息。原因是当时能买到的块煤又贵又有限，所以做饭一般只能用煤球，而煤球不断涨价暂且不说，主要是掺的黄土太多，不容易烧着，烧着了又容易灭，所以家家得用块煤的煤末掺入少量黄土来做许多比较容易烧着的煤球，两种煤球合起来烧，做饭才能保证有火。

欧阳先生既是教授，又是单身，经济上倒无需发愁。而家庭负担重的大学教师，有的不得不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有的只好当大衣、值钱的书籍等等，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赎回。我们住校内的年轻教员，刚返回北平的时候，入学生的伙食团，后来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同学们每顿吃的是粗糙的高粱米或窝窝头，菜就更不用提了。饭量大的小青年只能吃个半饱，“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也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我们一些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教职员另起了一个灶，请了个老太太做饭，起码可以保证吃饱。我们入伙的人，也得轮流去做煤球，用学校的摇煤球筛子大批地做。因此，我把欧阳先生

的那袋面粉放在厨房后，转身走出大门时，对她说：“先生！我今晚来帮您摇煤球。”

“谢谢你的好意，不需要！”她说完，“砰！”的一声，立刻把大门关上了。

象北大这种高级知识分子成群的机构，总几位抱独身主义的男女学者，国外的大学、研究所等单位里，这种独身主义者比我国更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只是热爱，而且到了迷恋的地步，而对成家传代、养儿育女，对正常人所享受的天伦之乐，都感觉淡然，以致认为是和搓煤球一样的“耽误时间”。他们的性格也由于环境而变得越来越孤僻，甚至于有一些“怪”，因而他们考虑和处理许多日常事务，自然与众不同。人们一般根据自己的情况，从不同角度看待上述独身主义者：许多人，特别是家庭妇女，认为不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因而万分同情他们；有人对他们这种生活抉择，百思而不得其解，从而对他们产生莫大的好奇心；有的读了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认为这必然是“失恋”的结果；还有一些特别好学习的青年，对独身老学者不知不觉地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心情——我，属于最后一类人。

黄昏，我借了学校的摇煤球筛子，又来到南长街五十二号。我敲了好久的门，也没有人来开——我懂得，这是故意让我吃闭门羹。可是，欧阳先生哪会知道，我有个鬼毛病：说了要做的事，非做到不可。过了两小时，我又去敲门，里面是那个白发老太太的声音：

“谁？”

“是我，赵孺山。”

“欧阳小姐说：不需要您来做煤球，她自己会做，多谢您啦！”

“请您开门让我进去再说。”

门，仍然关得死死的。我再敲，连老太太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次晨，我又带了摇煤球的大圆筛子来，这次不敲门了，而是站在门外等门打开。第一个开门走出来的，是住在里面南院的邻居，我告诉他我是北大的助教，来帮助欧阳教授摇煤球的，说完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我悄悄地把绳子套在院子里一棵大柳树的粗枝上，再将绳子的两端拴在筛子上。蓝布长袍一脱，便是我那身黑色旧中山装，我就开始一筛子接着一筛子摇煤球了。不到一小时，地上所有的小方煤块，都变成了煤球。

我在掸身上的煤灰时，白发老太太满脸笑容地走出来对我说：“可得谢谢您啦！真叫快！欧阳小姐一个个搓，要用好几个晚上呢！”

“请转告欧阳先生，往后我每个月发薪的那天，来给你们家扛粮食，摇煤球。”

“那更要谢谢您了！可欧阳小姐不会让您进来的。”

“我这不是进来了吗？”

在我们一老一少的笑声中，欧阳先生推开了她房间的门：“赵先生，万分感激！请进来洗一洗！”

我正张开口想要说“我回家洗”，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多么想看一看她的房间啊！

果然，里面是欧阳先生的书房，四周靠墙的几乎都是书架，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满了各种书籍。

“欧阳先生!”我诚恳地对她说,“我不想打扰您,我宁愿回家去洗。我想用五分钟时间大致看一下您有哪些书,好吗?”

她看了一下手表说:“你可以看十分钟,过十分钟我得动身去上课。”

我发现这位教授的兴趣相当广。除了大量的中外植物学书籍以外,还有许多文史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古典的和当代的中外文学书籍也不少,包括英语和法语原文版的书,还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和拉丁文大词典。此外,还有音乐、美术、园艺、医学、地理、历史、京剧、芭蕾舞等方面的书籍……我这算是开了眼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是如此丰富多采!

我和欧阳先生一同去北大途中,我不禁感叹:“书,乃是知识之主要源泉!”

她立刻对我说:“你刚说的,请再说一遍!”

“我刚才不过是自言自语,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书乃是知识之主要源泉。”

“你是听谁说的?”

“我小时候听到一个小孩子说她家大人是这么说的——您说这话对不对?”

“书当然是知识的主要源泉——这是最普通的常理,我也说过类似的话。高尔基就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书的作用。可是,古今中外都有烧书的人,还有禁书的人……”

她忽然不往下说了。我看见她脸上浮现了一种轻蔑的微笑,便问:“先生!有什么好笑的事?”

“我是笑那些大蠢人。他们越是要禁的书，人们就越要设法弄来看，结果读的人反而更多……赵先生！我能看出你读了不少禁书。”

我大吃一惊——她怎么看得出来？难道我说话时漏出什么了？我只好勉强地笑着说：“那不见得，您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我倒想知道。”

“从你的为人。”

“为人和偷看禁书有什么关系。”

“人和书怎么没有关系呢？我是研究生物学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它的本色，而人，这种有高度思维能力的动物，他的本色不但体现在生理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他的言行，通常叫‘本性’。作家的本性，必然体现在他所创作的书中。读者的本性如果和某种书有共鸣之处，他才愿意读，否则读不进去。所以，我认为某种书，你是读得进去的。”

我心想：先生啊先生！您自己要不是也熟悉这类书，您怎能知道我是否读得进去呢？

三、黎明前

在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中，为了设法使自己的力量不遭到敌人的破坏，各大学的学生会以及进步社团一般都故意安排出身于大官僚家庭但有觉悟的青年担任骨干。这些人，特务警察不便随意逮捕；即使被抓进监狱，也便于保释出狱。游行时，走在最前排的，往往是抗战时期参加过青年军的进步学生，他们故意身穿原来的美式军装，头戴钢盔，因而警察见之也不敢轻易武力镇压；一旦和警方发生冲突，他们首

当其冲，英勇抵抗。

当时，北大的进步力量比较雄厚，我的任务是与师范学院和辅仁大学的革命教师联系，协助这两个学校扩大进步力量。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进步力量比较薄弱，他们同时受到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两个方面的监视，工作比较难开展。有一次，辅仁的一位同志给了我一张拉丁文的印刷品，上面只有几行字。他说这种“讲道传单”从国外源源而来，但从不是寄来，而是由人带来的。他要我找个“可靠”人翻译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当时立刻想到欧阳云先生——我不是在她的书架上看到大本的拉丁文英文词典吗？但是，她“可靠”吗？……

自从闯进大门摇煤球的那个早晨起，每个月一发薪，我便去欧阳先生家帮她解决粮食和煤球问题。每次我敲门后，里面问我是谁，我总是回答：“摇煤球的。”

我在与她的交往中，了解到她年轻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最基本的了解，对学运起码可以说抱同情态度，谈起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以及国民党的腐败时，她深感愤慨。但是，她却置身于一切政治活动之外。

我给她看那张天主教讲道书。“这是一个老同学托我翻译的一页东西，不知道是干嘛的。我只是看得出这是拉丁文，可我不懂拉丁文，不知道您是不是能抽点时间帮一下忙？”

“没有几行字，我试一试吧！”她接过去一看，双眉立刻抬起，她说：“Sermona 讲道；Communisti！共产党人……怎么讲道书上会谈到共产党呢？”

她立刻把那本拉丁文英文大词典搬到桌上，查了几个字，然后质问我：“你这是哪儿弄来的？”